

教 育

新加坡历史教育发展历程概述及分析

——以世界历史教学为讨论重点*

彭 慧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新加坡的历史教育服从于其整个教育体系理念及制度的变化,在二战后的七十年发展历程中,随着其国情变化,其中小学历史学科,尤其是世界历史教学的目标与内容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的演化历程。从世界历史教学的欧洲中心论与本土独特性、全球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这两个角度、四个维度来考察,新加坡的这一演变历程反映了其历史教学极强的实用主义与功利性,而这背后则是新加坡本地国家建设与国族建设失衡所造成的。以历史学科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的文化涵养功能被大大忽视,新加坡本土文化的塑造与形成亦受到阻碍。

[关键词] 新加坡; 历史教学; 国家建设

[中图分类号] G511.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6)04-0056-06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Focused on the World History Education

Peng Hui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430079)

Abstract: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histor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of three stages. Taking the teaching of world history as an example, this change reflects its utilitarianism, pragmatism of history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s excessive atten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building, which lead to the malfun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education and other humanities. Singapore local culture formation is also affected.

Key Words: Singapore; History Education; State Building; Nation Building

作为海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国情与政策引导,新加坡的文化发展也有

着很鲜明的本国特色,人文学科教育亦是如此。学界对此也有关注,如 Ting-Hong Wong 与 Michael Apple 关于新加坡课程改革与国家建设间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6-10-23 ;**[修回日期]** 2016-11-20

[作者简介] 彭慧(1981-)女,安徽黄山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湖北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亚洲主要国家‘世界历史’学科教学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阶段性成果。

研究^[1]以及 Saravanan Gopinathan 所阐释的有关全球化条件下新加坡的国家建设与教育政策的改变^[2]；而 Yeow Tong Chia 的《为国族与国家建设服务的历史教育：以新加坡为例》^[3]则直接讨论其历史学科的发展变动。本文聚焦其近七十年来的历史教育发展历程，试图细致描述新加坡优先国家建设政策下其历史学科发展的得失以及人文主义缺失的现状。

一、新加坡历史教育的历时性发展

二战后，新加坡尚未正式独立，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教育体系，其历史教育很大程度上直接照搬其它华语地区。由于政治原因，此期间新加坡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基本沿袭当时台湾的历史教育大纲。就世界史而言，主要关注世界几大文明及西方文化，对亚洲本土历史也是学习重点。譬如在小学阶段，从公元前 1000 年至 1500 年的各文明史介绍会在低高年级重复学习两次，中国及印度历史也是关注对象。而在初中及高中这一层次，东南亚历史的介绍及殖民历程均是学习内容。应该说这一阶段本地的拿来主义式的历史教育仍未本土化，也不能体现新加坡历史教育的特征^[4]。

此后，自 1965 年准备与马来亚分离，摆在李光耀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如何立国与立何种国。国际上，新加坡当时处于穆斯林国家包围之中，又是夹在冷战格局间的“海外华人”国家，处境非常尴尬。而在新加坡国内，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新加坡国内政治力量分化，社会主义阵线与人行动党分立对抗，工会力量也非常强大。半官方的人民协会与建国会在华人社会影响力广泛，而且让李光耀不安的是，他们“竟能毫不费力地支配大多数人”，而“人民协会又同宗乡会馆、民间组织、文化团体以及大约 100 个民众联络所都有联系。”^[5]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加坡国内政治的整合与统一、经济的快速腾飞显然成为这个新立国家的第一要务，生存下去是新加坡立足世界的首要目标。

因此，相应的是，这一阶段新加坡的整体教育理念为“生存教育”(education for living，简称 E-FL)。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其目标是“向孩童们灌输东方传统价值观，让他们理解是非，知道新加坡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同时传授一些简单的历史与地理概念。”^[6]由此，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

下，历史与地理等人文学科只成为需要“简单传授”的附属学科，而数学、物理、科技等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理工类学科则最为重视。新加坡建国元勋、国会议员拉惹勒南当时就公开表态，数学、科学及技术的学习被认为是“有用的”，这些教育能够生产“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以满足新加坡工业化和发展的要求。而历史则没有功用，也不能告诉我们未来，更不能帮助新加坡“编程生活与未来”。这样，与地理课一起，历史课被踢出了中学必修课程。因为“我们不需要过多强调过去。我们也不认为国族构建与现代化需要把当下新加坡一代与过去几代人的价值与辉煌联系在一起。反之这种国族构建对新加坡未来就是灾难性的。对我们来说，前瞻未来更重要。”^[7]

历史学科总体不受重视，在具体学科教学内容上也有极大的选择及偏向性。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本地的种族冲突阴影仍未消散，为避免引起新的种族不合，新加坡本地建国历史成为讨论与学习的禁忌，而对西方历史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史却成为其学习重点。关于这一点，李光耀丝毫不忌讳新加坡的殖民历程。他说：“我认为我们是极少数幸运的人群，可以为过去而自豪，而这一过去的历史真实并不需要重写或修改。这段与英国人民密切相关的历史尽管只有短短 150 年，却足够让我们珍惜重视。”^[8]因此，尽管与独立前相比历史课总体教学内容已极大压缩，然而重视与欧洲的联系却使世界史成为这一阶段教学的主要内容，如 1969 年出版使用的《牛津新加坡进阶历史：文明的发展》一书中，二年级小学生必修历史内容为几大文明遗产及欧洲文艺复兴^[9]。小学高年级的世界史课程也涵盖了“马来亚 1400 年至 1963 年历史、大英帝国 1740 年至 1960 年历史及东南亚 1500 年至 1945 年历史”^[10]。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十几年内，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西式精英，为避免国家陷入分裂的泥沼，大力提倡国族认同，政治上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强调法治治国，推广西方政治思想与公民思想。此后这一发展策略在一段时期内开始收效，新加坡举国同心，不但没有陷入政治分裂的泥沼，甚至在弹丸之地上创造出了经济奇迹，至 80 年代初时，已跻身亚洲新兴产业国之列。但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快速工业化与都市化及华人文化的式微也

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青年一代普遍西化严重,崇尚物质,社会拜金主义泛滥,出现了所谓的道德危机。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开始担心本地年轻人正在成为“过于西化”的一代,从而侵蚀其新加坡政治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成为政府的重要责任,而历史学科的作用开始受到极大重视。因为这一阶段的精英们认为,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对政治及社会延续及变更的充分理解:“俗语说,历史总在重复,但其并不需要重复,只要我们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新加坡人应该有一种对过去的历史感,从而使得他们能更深入的理解当下,这种历史观也会为将来设定方向。”^[11]

因此,此时历史教育大纲的教育目标被重新设定为:“培养学生的新加坡认同感;传授其对新加坡历史及先辈的自豪感;展示新加坡与外界间的互动及新加坡对世界的贡献;突出新加坡历史对当下及未来发展的作用”^[12]。历史等人文学科对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作用又被发掘出来:从1984年开始,中学低年级开始执行新的历史大纲,历史又成为必修课程。而小学的社会课程中历史课也仍是必修的。

教学内容上,在这种指导方针下,新加坡本地近代历史的学习开始受到重视。新加坡本地历史被当作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来呈现,成为塑造新加坡国民认同的重要工具。1984年,中学历史教育小组根据大纲编撰了现代新加坡史,主要对象为中学一年级学生,全面叙述了新加坡从开埠到独立的历史过程^[13]。

另外,面临着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冲击,新加坡上层开始宣扬代表东方文化的亚洲价值观,亚洲区域历史的一体性也成为世界史的重要教学内容。例如,1994年的中学九年级及十年级历史课程的学习内容包含1819年至1963年的马来亚、1800年至1954年东南亚历史以及1919年至1952年世界现代史^[14]。而在这一时期的高中会考的历史课程中,除去原有的欧洲史及中国、日本近现代史内容外,也加入了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历史课题^[15]。

20世纪90年代末期后,面临新的世界格局及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新加坡教育又开始新的变化。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的努力,新加坡国家建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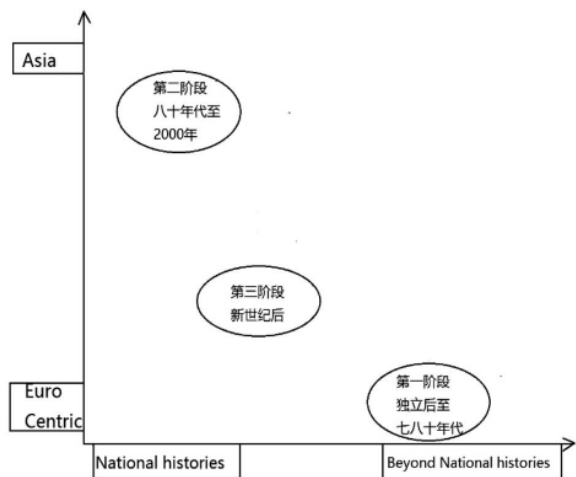
主要任务业已完成,但作为现代城市国家,所面对的全球化及国际化任务更为艰巨,新加坡人应该如何面对?新加坡教育部称述:“在21世纪,新加坡将面临全球化、技术加速发展及亚洲经济腾飞带来的艰巨挑战。历史课程大纲的改革就是为了迎合21世纪新加坡的需要。新的大纲要在世界历史及本地历史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也会注意历史观、学习技巧及学习内容的平衡。”^[16]由此,1997年,新加坡时任总理吴作栋就此发表专门演说,推出了“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民”(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 (TSLN))的教育改革计划。他指出“TSLN计划并不是教育部的一个口号,而是确保新加坡能够一直保持前进的良方”^[17]。在此目标下,学生将被教育成有知识的、多样性的、有IT能力的人群,他们能够触类旁通、分析总结、应用知识以解决问题。这是一群具有创造性思维、充满活力、不惧挑战且有合作精神的终身学习者。由此,TSLN有四大内核,即前沿创造性思维、IT能力的培养、国民教育及卓越的行政素质能力^[18]。

因此相应的是,1997年以后,无论在新加坡普通水准会考(O level)还是高级水准会考(A level)历史教育中,教学的目标更具全球视野,即“让新加坡年轻人了解至关重要的国际事务,以便于他们拥有更广泛的全球视野,从而了解新加坡与其它国家间的依存关系,特别是与我们有着共同殖民历史的近邻马来西亚。”^[19]具体说来,中学低年级历史课程的教学要求是“涵养国民政治认同、理解本族群;培养学生更广泛的世界观从而便于他们知识面更宽、更具无畏的前瞻性和企业家精神;通过掌握历史分析、辨析、归纳能力来促使其更高级思考能力的形成。”教学内容上,一整学年会用来学习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建立,新加坡与邻国间的冲突及新马分家。另一整学年则会完全关注1910年至1980年间的现代世界历史,主要内容有联合国的成立,东西方的冷战及苏联阵营的失败^[20]。同时,在课程内容上,亚洲历史内容减少,世界历史的世界性、全球性凸显出来。如初级学院历史课程提供的四篇学习论文中有三篇都是非亚洲的,即1450年至1973年的欧洲历史;1960年世界大事记;1497年之前的世界历史^[21]。

二、新加坡历史教育内涵及功能上的深入分析

由上述三个阶段纵向历时性的呈现可知,以世界史为代表的新加坡历史教育基本服务于其国家建设目标与国情变化,其在地化及实用主义取向是很明显的。横向看来,从其教学取向、特别是世界史教学的四个维度来考察,其功利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般而言,亚洲地区的世界历史教学,均有着区别于欧洲地区的内部共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发展的“欧洲中心观”(Euro-centralism)向来对世界史学科教学产生巨大影响,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便是在充分考虑欧洲地区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去欧洲中心化”(De-Euro centralism),还原亚洲在世界历史学科学习中应有地位。第二,亚洲地区多数国家为二战后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在世界史教学中,如何处理世界历史发展大方向——“全球性”(Globalization)与本国历史的“国家民族性”(Nationalism)也是其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两个维度平衡的把握,构成了亚洲地区世界历史教学的共性基础,新加坡世界史教学也不例外。然而,由于新加坡特殊的国情,如下图所示,新加坡历史教育在西方中心论 VS 亚洲本位、国家历史 VS 超越本地历史这两个角度、四个维度的象限视角下,有着自身独特的表现。



具体而言,首先,在独立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阶段,如上所述,新加坡的历史教学取向并不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与欧洲视角

更为贴近,如图所示。这与其它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明显不同。一般而言,从创始之初这些民族国家就注重国家政治认同的构建,重视发掘本地历史及传统文化。相对应的是,会对殖民宗主国及本地的殖民史进行反面的书写,从而为其新的政治身份认同塑造凝聚基础。而相反,新加坡特殊的国情与民情却使其不得不暂时抛弃本地历史的撰写与传授,历史学科等人文学科也成为二等学科,只保留殖民史与西方文明的教学。因此很明显的是,新加坡的历史教育取向是为保证此时新加坡国内政治统一与民族和谐。

进入80年代以后,本地世界史教育突然从象限的一端跳至另一端:这一时期本地历史书写与教授成为重点,而新加坡历史也被当作具有独特政治、文化历史特点的亚洲近代一体化历程中的重要部分来呈现。历史学科的亚洲性及国家主义特征似乎比较突出。历史教育成为塑造国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是其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后的新加坡世界史教育似乎回归到平衡的中心位置,亚洲与欧洲、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间的矛盾也得以调和。原因在于,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构建,新加坡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业已形成,国家建设中公民政治认同建构的目标基本达成,新加坡面临的新任务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

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分析,直观的看,以世界史为代表的新加坡历史教育,其变化就一直服从于国情与国家建设目标的演变,极具实用主义色彩。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即便是各阶段表现出的对西方历史的重视及亚洲性、全球性,其背后也都体现出其历史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本土国家建设。

首先,新加坡历史教育中曾提倡的所谓“亚洲式价值观”,是李光耀等政治精英对抗西式民主文化的有利武器,然而实际中政治领袖及课程制定者们并不以亚洲或者范围更小的东盟作为其价值观及民主体制的参照者。尽管表面上历史及公民教育课所标榜的是“亚洲式民主”,但其本质则是要灌输新加坡式的民主,这是根据新加坡本地特色,其实主要是本地政治人物的观点而制定的历史观下的“民主”^[22]。这种民主体制是新加坡式威权民主,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李光耀一直在本地历史教育中主张的亚洲式价值观最终是为其本土的国家建设服务的。

其次, 尽管新加坡历史教育中的全球性及西化特征比较明显, 但实质上, 迎合全球性只是其经济实用主义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方式方法, 从整体上说, 新加坡教育的本土性是根本的, 且有着两个重要的本地特征。第一, 在新加坡, 教育分流制长期盛行。其实在整个 70 年代, 西方也面临着教育两极化的现象。英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创造平等教育机会, 建立综合性学校。而新加坡面临着双语教育下部分学生的落后现象, 则使用了等级式分流制度, 这其实与全球教育潮流是不符的。第二, 新加坡教育的另一个本地化的特征则在于其权力的集中化, 历史教育也是如此。在政治精英看来, 这种集中化是国家意志体现的必然结果, 也是迎接政治与教育挑战的要求。政府教育部与教师联合会之间的关系一向和睦, 而其国内的绝大部分优类学校都是公立的。(新加坡)政府从未认为教育社会化、社区化是发展方向, 因此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是从不吝啬。因为教育从不被认为是消耗税收的一项消费, 而是对本地人力资源的投资性事业^[23]。

由上可见, 若从上述的两个角度、四个维度来观察新加坡的历史教育, 虽然在不同时段内其呈现出独特的亚洲性及全球性, 但背后却体现着本土化的实质, 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导向非常明确, 而这与新加坡本地长期重视国家建设、轻视国族建设大有关联, 历史教育一直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目标。作为结果, 历史及其它人文学科的文化涵养及打造国族文化的功能被忽视, 新加坡整体的国家文化形成也受到阻滞。

三、新加坡国家建设优先政策与历史教育

现代国家, 无一不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一国家形式发源于西欧, 并是以一族一国的方式而存在, 其 nation 先于 state 而存在, 因此在这些国家, 国家建设即 state building 便是其立国之后的主要任务。但在广大后发国家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 一族立国实在不可能。因此, 这些多民族国家便同时面临着两个重要任务, 一是国家建设, 二是国族构建。这二者所囊括的范围, 既重叠又分立, 对于新立国家的意义也各不相同。而后者, 并没有西欧先发国家的经验可询, 各国也采取了各种不

同措施与政策, 更产生了不同效应。

国家建设, 根据政治发展学的研究,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 政治统一与整合。第二, 培育国家认同。第三, 建立现代国家^[24]。而谈及国族构建, 则相对复杂。由于国族不是自然发展而形成, 其政治性与构建性决定了这一虚体必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实体基础上方能达成, 因此, 国家建设更强调的是社会性同质身份及对国家政治实体的认同, 即国民身份认同, civic identity。而国族构建中的 nation identity 不仅包含着这一社会性国民身份认同, 更多的蕴含了文化性特征, 即 cultural identity。因为“国族的巩固, 不仅需要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经济, 还需要共同的文化。有了共同的文化, 国族就从“想象的共同体”变成现实的共同体, 而这正是新加坡所缺失的。

新加坡的国家建设与国族建设, 从立国之初开始直至今日, 从未停歇, 尤其是前者, 而国族构建特别是文化建设, 似乎并没有成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主要议程。国族构建的最终目标, 是建立在共同坚实文化与政治实体基础上的各民族, 逐渐融合成真正共同体。相反, 政府信奉多元文化主义, 在相应的各项教育政策上, 也采取了偏重国民政治认同教育、轻视国族文化涵养的策略。

就历史教育而言, 众所周知, 其本身是国家建设与国族文化构建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中, 历史教学承载着“公民身份认同构建的重任”。正如海恩与塞尔登指出的: “教科书提供了现代社会中国国家性、公民性、理想化的过去及希冀的将来得以表达并传播和灌输的最重要的方法”。而在东亚, 许多国家都试图通过国民教育系统, 特别是历史教育来引导、帮助构建其国民的国族认同及爱国主义^[25]。然而在新加坡, 如上所言, 由于其本身教育系统的功能更多偏向国家建设的塑造, 其历史教育同样也过多的承载着公民政治认同构建的重任而非国族文化的打造。新加坡刚刚独立伊始, 李光耀就认为在当时的国际与地区内部环境中, 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远超出国族建设。因此国家建设的第一大任务, 即新加坡国内经济的腾飞、政治的整合与统一显然成为这个新立国家的第一要务, 历史教育亦服从于整体教育理论, 即生存教育。而进入 80 年代后, 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开始担心本地年轻人正在成为“过于西化”的一代, 从而侵蚀其新加坡政治认同。在这种背景下, 培育公

民的国家政治认同这第二大国家建设任务成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历史学科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新加坡本地历史书中所谓亚洲价值观成为重点内容。90年代末期后,新加坡前两个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已完成,但如何面对全球化及国际化的巨大考验又成为其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历史教育的任务亦是如此。由此可见,新加坡历史教育纲要及教学内容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国家建设三大任务的变化而改变,而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本身的人文涵养及打造国族文化的作用却被明显忽略了。

因此,对于新加坡历史教育的目标与功能而言,人文素养培养是服从于政治构建目标的。塑造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忠诚及信赖即“爱国主义”从而保证国家的存在及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尽管近十年来历史教育进行了不少的改革,如从2002年开始,历史教科书开始关注方法论及材料来源,鼓励学生对史料进行不同解释,但争论、辨析及历史人文意识的培养并不是历史学习的主流。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所颁发的教育纲要也是如此规定的:小学生被教导要热爱新加坡,中学生要了解新加坡,而初级学院的学生则要引领新加坡。历史教育所内含的辩证、质疑等人文精神则不受鼓励,不辩是非的一边倒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才是其历史教育的本质。历史教育长期服务于政治的导向近些年也受到了学界质疑,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点批评。首先,他们认为这种偏向性的爱国主义会桎梏学生未来的人文思维发展。其次,整个社会制度也会使得学生逐渐习惯于顺从与安稳,缺乏文化创造性与批判精神,这是历史等人文教育的失败。再次,即使新的教学纲要鼓励一定的创新性,但仍带有极大的功利性,“只是让新加坡人更好的面临新世纪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些创造性思维也被引导应用于“有用的”领域^[26]。然而总体看来,目前这些批评并没有受到新加坡政府及教育界的重视。

现实中,这一导向对本地文化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正是由于政府对历史等人文学科文化涵养功能的忽略,使得新加坡本地文化尤其是占主体的华族文化近年来发展受到阻滞并陷入了彷徨与困境,学界人文精神式微,草根文化发展也停滞不前。例如2014年8月新加坡四十九周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总理李显龙自豪地宣告:“经过多年的酝酿,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南洋风格”。然而当地最大的主流华语媒体《联合早报》

就提出置疑,认为独特的新华风并没有形成。因为目前在新加坡,只有文学与语言领域被称为“新华文学”,其它艺术门类如书法、音乐等,能独成一家并产生影响的几乎没有,难以在国际产生反响而可以冠之以“新加坡式华族文化”^[27]。即便在“新华文学”及语言领域,学者们也认为试图建立独立的本地华语文化和所谓汉语和文学的新标准是不可能的,而这均与上述政府的人文学科教育的偏向性密切相关。

总之,新加坡中小学历史教育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变迁,其服务目标却一直偏重于国家建设及国家政治认同的构建。虽然在不同时期的世界历史教学中体现出一定的亚洲特殊性及全球性,但由于整体教育上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得历史教学的本土主义及实用主义更突出,直接影响了其文化涵养功能地发挥,更大层面上对新加坡国家文化的形成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历史教育功能上的偏向性可能是我们要汲取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 [1] Ting-Hong Wong, Michael Apple, Rethinking the Education/State Formation Connection: Pedagogic Reform in Singapore, 1945-1965,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J], Vol. 46, No.2, 2002.
- [2][17][18][23] Saravanan Gopinathan, Globalisation, the state and educ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 CERC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J], no. 1.
- [3][7][8][11] Yeow Tong Chia, History education for Nation Building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ingapore, Citizenship Teaching and Learning [J], Vol7, Number2, 2012.
- [4][6][10][12][14][19][21] Sim Yong Huei, World Histor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paper submitted to the Third Congress of 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 in Singapore[J], May, 2015.
- [5]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M].北京:世界书局,1998:445.
- [9][16][20] Goh C.B. and Gopinathan S.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ingapore, 1945-2000, in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M], eds. Edward Vickers and Alisa Jones, Routledge, 2005, p.223.
- [13][15] 李晓康.新加坡历史教育与政治发展[J].公共管理研究, 2011(9).
- [22][25][26] Christine Han, History education and 'Asian' Values for an 'Asian' Democracy: the Case of Singapore, Compare[J], Volume:37, Issue:3, 2007, p.10.
- [24]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J].政治学研究, 2009, (4).
- [27] “南洋风”还是“新华风”及站长的话[N].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4-08-29.

(责任编辑:黄世棉)